

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1978 - 2013

潘寄青¹，李广泳²，潘悦萌³，李翠萍⁴

(1. 山东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2. 清华大学 经济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4;
3. 中信集团 资产管理公司, 北京 100001; 4. 济南市黄亭体校, 山东 济南 250013)

摘 要:文章运用回归模型和 VAR 模型,以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人均消费作为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978 - 1997 年间的财政农业支出系数为 0.93,而 1998 - 2013 年间的财政农业支出系数为 0.44,表明农民消费和财政农业支出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且 1997 年之后的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消费的带动作用不如改革开放之初;财政农业支出的冲击短期内对农民消费会造成波动性。因此,财政支农政策要注重长期规划,以稳定农民的消费预期,最终扩大农村消费。

关键词:农民;消费需求;财政农业支出;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 929X(2015)03 - 0053 - 08

一、引 言

现阶段,我国的内需不足主要体现在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农民的消费需求不足。由于农村市场是我国的基础市场,在农村集中了我国超过半数的消费者,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者群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购买力逐步增强,日后其消费潜力也必将被激发出来,终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最持久的动力。据国家统计局预测,农村人口每增长 1 元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 2 元的消费需求^[1]。但 2008 年我国农村的消费水平还不到城市的 1/2,拥有中国 1/2 多人口的农村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始终只占据 1/4 - 1/3 的份额,表现出较多的人口与较少的消费份额极不相称的现象,农民消费需求不足必然使我国总体的消费需求不足。在这种背景下,改善农民消费需求,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成为当务之急,研究农民的消费规律,促进农业的产业化,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进一步扩大内需,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十分困难。但是,农民的消费水平低,也意味着农民消费存在充分挖掘的空间,因此,研究我国农民的消费需求对促进经济的增长非常迫切和必要。如

收稿日期:2015 - 01 - 18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经济转型期拉动山东省农民消费增长的实证研究”(13BJJJ03);山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山东省农民消费增长的政策研究”(2013RKB11003)。

作者简介:潘寄青,男,山东临清人,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公共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财政政策;李广泳,男,山东定陶人,清华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财政政策;潘悦萌,男,中信集团资产管理公司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财政政策;李翠萍,女,山东章丘人,济南市黄亭体校会计师,研究方向:财政政策。

何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自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几年,研究我国农民消费需求的文章颇丰,有关提高农民消费的观点大致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1)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促进农民消费。贾小玫等^[3]认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会较大提高农村的消费需求,并提出应该建立代替农民土地保障的生活保障制度^[4]。吉朝晖等指出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防止居民医疗支出过快增长,增强居民消费信心^[5]。张海燕也提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等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使农民降低预防性储蓄而增加消费^[6]。郭海清认为: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性支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强农民的消费能力^[7]。王宾提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制度,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农村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8]。(2)通过消费信贷制度来提高农民消费。范剑平认为进一步启动消费需求应适时降低利率,扩大消费信贷^[9]。吉朝晖等指出,启动农村消费需求完善消费信贷政策与加快个人信用制度建设^[10]。朱信凯以合会中的轮会为例,对其制度背景、运行机制、与正规金融共存的边界等进行了实证研究,阐述现阶段农村非正规互助金融组织对于扩大农户消费,减少流动性约束方面的独特优势并给出探索性建议^[11]。(3)通过加大对农村公共支出来改善农民的消费环境进一步来提高农民消费需求。范剑平认为,进一步启动消费需求应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以制度创新破除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城乡“栅栏”;减轻农民负担,扩大政府对农村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投入^[12]。王国华认为,阻碍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13]。尹世杰强调要加速发展农村文化教育,提高消费力^[14]。吉朝晖指出启动农村消费需求应完善和调整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具体包括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整顿市场秩序和改善消费环境^[15]。蔡防认为,农民增收的源泉应该来自于市场,来自于产业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因此在市场体系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应继续发挥它自己的作用来改善农民的生产环境,规范市场^[16]。曾萍提出应加快调整产品结构步伐,适应农村消费新变化,加大农业政策扶持和转移支付力度^[17]。王宾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国家投入适当向农村倾斜,缩小收入差距,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同时改革财政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落后地区农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上述研究成果对于提高我国农民消费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大多数研究强调农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外在环境,缺乏从财政农业投入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所以有必要在分析中着重考虑财政农业支出的作用^[18]。

鉴于此,本文力求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目前我国农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以及当前我国农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最后从公共财政角度提出扩大我国农民消费需求的对策建议。

二、模型估计

(一) 理论基础

财政支出政策是国家为了调节宏观经济所选用的一种为了达到政策目标的财政政策工具。国家通过运用财政支出根据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要有意识地影响和调控经济,促进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我国应该适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对我国农民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进而扩大国内总需求。之所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是希望达到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刺激消费需求。但是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要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财政政策本身的制定方面。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支出各部分的比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用于建设方面的支出对总需求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其除了能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外,还会影响到家庭或个人的生产和效用函数;财政转移支付的效果也较明显,由于其能够形成社会保险,从而抵御风险,所以可以增加人们的消费支出;还有一部分是财政对行政和国防的支出,由于其不能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决策,所以这部

分支出有可能不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由此可见,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各个支出项目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各种财政支出间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

其次,外生环境的改变将会通过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预期并对他们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财政政策的效果。实施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企业可能会增加投资力度,消费者的消费成本也有可能降低,因此整个社会有可能增加投资和消费。但是不同的企业和消费者对财政支出政策的敏感性是不同的,如果政府财政支出政策向对政策敏感度不够的企业或消费者倾斜,效果有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低收入者的消费会因此收入差距扩大而减少,而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如果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使他们的收入更高时,消费需求增加的效果就不会很明显。由此可见,外生环境也是很重要的,也影响到财政政策的效果。该部分探讨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这里对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消费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揭示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消费的促进作用。

这里借鉴胡书东通过推导得出的消费支出模型,并将其扩展,得出财政农业支出和农民人均消费支出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19]。所以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用财政农业支出(PF)做解释变量,采取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的方法,选择农民人均消费支出(PC)作为因变量。为消除异方差对 PC 、 PF 做对数处理。

(二)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 1978 - 2013 年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和农民消费支出为变量进行分析,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等。为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农民消费支出的各个指标分别取对数将其平减。但是,我国官方数据中没有 1985 年之前的农民消费价格指数,所以,本文借鉴 Gale Johnson 的指数构造方法,1985 年之前的农民消费价格指数用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78 = 100)代替,1985 年及其以后的指数是将当年官方公布的指数(1985 年 = 100)乘以 1.342 而得来^[20]。

(三) 实证检验

这里采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建立模型,基本思想是:先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检验序列是否平稳;然后对财政农业支出和农民的消费支出这两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如果这两个变量不是协整的,就不会存在稳定的关系,这样对变量做出的回归将可能导致伪回归现象。

1. 单位根检验

首先通过 ADF 单位根检验检验序列的平稳性,得出各变量的 ADF 检验结果如下(见表 1):

表 1 各变量的 ADF 检验

变量	检验类型(c,t,k)	ADF 值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10% 临界值	结论
lnPC	(c,t,0)	-1.236	-2.645	-1.953	-1.622	不稳定
* lnPC	(c,t,1)	-3.019	-3.685	-2.971	-2.624	稳定
lnPF	(c,t,0)	2.277	-3.675	-2.967	-2.622	不稳定
* lnPF	(c,t,0)	-4.684	-4.308	-3.573	-3.220	稳定

其中 * lnPC、* lnPF 分别表示对 lnPC、lnPF 取一阶差分,检验结果表明:经过处理的各个变量都是平稳的。

2. 协整检验

如果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平稳的,直接通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导致伪回归,需要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因此下面进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协整检验就是检验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变量能被自变量的线性组合所解释,各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因变量不能被自变量所解释的部分构成一个残差序列,这个残差序列应该是平稳的。对模型进行估计。

lnPC 及 lnPF 都服从 I(1),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进一步检验二者之间的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 EG 两步法进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即设 $\{X_t\}$ 和 $\{Y_t\}$ 均为 $I(d)$ 变量,用 OLS 法建立模型:

$$Y_t = \beta_0 + \beta_1 X_t + u_t$$

以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然后对残差 \hat{u}_t 作平稳性检验, $\hat{u}_t = Y_t - \hat{\beta}_0 - \hat{\beta}_1 X_t$,若残差是平稳的,则 $\{X_t\}$ 和 $\{Y_t\}$ 存在着协整关系,否则就不存在协整关系。

由于变量 $\ln PC$ 与 $\ln PF$ 是 $I(1)$ 序列,从 $\ln PC$ 的时间走势图(图 1)、 $\ln PC$ 和 $\ln PF$ 的散点图(图 2)可以看出在 1997 年存在结构突变,并呈线性关系,由 chow 结构突变检验证实了此结论。

由表 2 我们可以看出,表明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消费支出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对此进行做回归分析,由于农民人均消费对数的时间序列在 1997 年存在结构突变点,回归估计式在时间上以 1997 年为界分为两部分:

1978 - 1997 年回归式:

$$\ln PC_t = 3.42 + 0.93 \ln PF_t + 0.84 AR(1)$$

(10.14) (9.74) (3.64)

调整后的 $R^2 = 0.98$, $DW = 1.96$

1998 - 2013 回归式:

$$\ln PC_t = 5.40 + 0.44 \ln PF_t + 0.64 AR(1)$$

(19.79) (10.42) (2.33)

调整后的 R^2 , $DW = 1.84$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到,两阶段模型的拟合优度都比较高,且各项参数显著。若变量序列 $\ln PC$ 与 $\ln PF$ 存在协整关系,则模型估计式的残差序列 E 应具有平稳性。如果同时对两个模型的残差序列做单位根检验,ADF 检验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

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消费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在模型的估计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1978 - 1997 年之间财政农业支出的系数为 0.93,这表明农民消费和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即财政农业支出增加 1 个百分点时,当期消费将会增加 0.93 个百分点;但是在 1998 - 2013 年期间财政农业支出的系数为 0.44,即财政农业支出增加 1 个百分点,农民消费支出将增加 0.44 个百分点,很明显近期的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消费带动作用不如改革开放之初。这也证实了随着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对农业越来越忽视甚至是弃耕,从而导致实际农业人口萎缩,致使农村交易额相对下降,结果消费变弱。另一方面,在 1997 年之前,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未推行之时,农民在可支配收入上仍然有较大空间,相对农村商品交易活跃,在这之后,农民的大部分可支配收入被迫从事教育、医疗等交易,进而压缩了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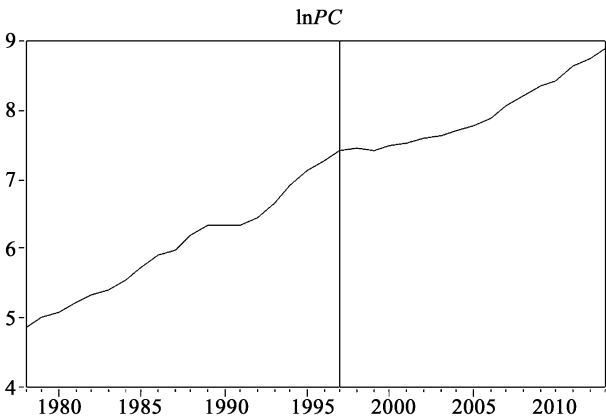


图 1 农村人均消费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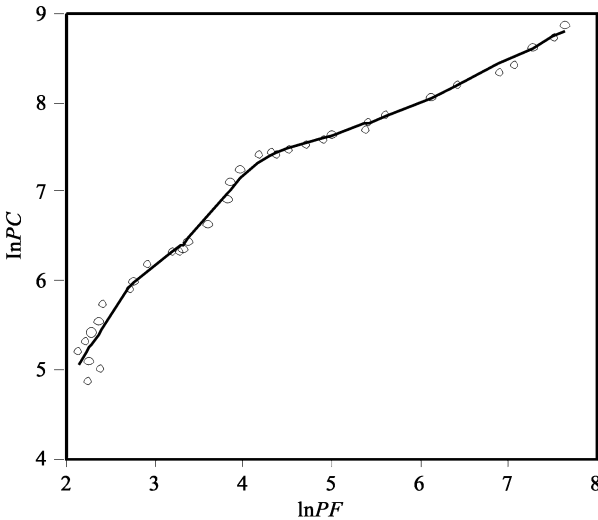


图 2 支农财政支出与农村人均消费之间散点图

表 2 Chow 突变点(1997)检验结果:

F - statistic	27.972	Prob. F(2,27)	0.0000
log likelihood ratio	34.792	Prob. Chi - Square(2)	0.0000
Wald Statistic	55.943	Prob. Chi - Square(2)	0.0000

表 3 1978 - 1997 残差 ADF 单位根检验

检验类型(c,t,k)	ADF 检验值	显著水平	临界值
未差分(0,0,1)	-7.010	1%	-3.670

表 4 1998 - 2013 残差 ADF 单位根检验

检验类型(c,t,k)	ADF 检验值	显著水平	临界值
未差分(0,0,4)	-7.791	1%	-3.007

3. VAR 模型的构建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财政农业支出和农民消费支出之间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现在建立 VAR 模型,来验证短期财政农业支出的变化对农民消费的影响。估计如下:

(1)模型结构

以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人均消费支出两个变量构建 2 维的 VAR 模型,其设定如下:

$$\Gamma_t = A_1\Gamma_{t-1} + \cdots + A_p\Gamma_{t-p} + \mu_t \quad t = 1, 2, \cdots, T$$

其中, Γ_t 为 k 维的内生向量, p 为滞后阶数, A 为待估计系数矩阵, T 是样本数据个数; μ_t 是 k 维扰动向量, μ_t 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期及等号右边内生变量的滞后期相关。

(2)平稳性检验

如图 3 所示 ,无特征根在单位圆外,可知序列平稳。

(3)VAR 模型的估计结果

$$D(\ln PC) = 0.79D(\ln PC(-1)) - 0.32D(\ln PC(-2)) - 0.15D(\ln PF(-1)) + 0.10D(\ln PF(-2)) + 0.07$$

(4)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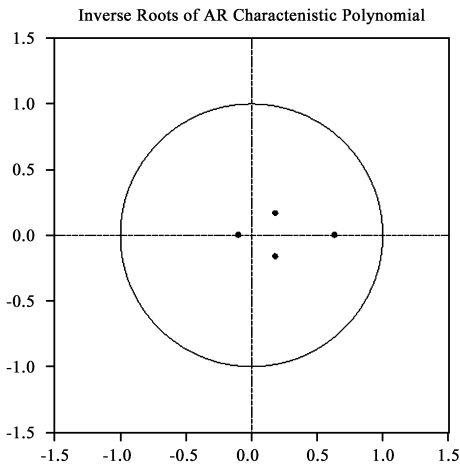


图 3 平稳性检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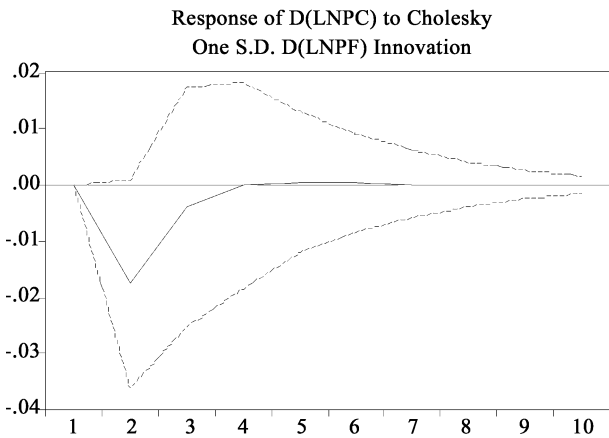


图 4 农村消费对财政支农支出冲击的响应图

由模型估计结果(3)和脉冲响应图 4 我们可以看出,短期内,农村居民消费受财政农业支出影响较大,给与一个单位财政农业支出新息相冲击后,第 1 期开始负向作用于农民消费,此作用大约在第 2 期之达到最大,之后影响迅速减弱,第 4 期之后恢复到初始状态。这表明短期内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明显。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财政政策在扩大农民消费需求上需要长短期具体对待,尤其应该注重长期效应。在长期,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消费需求具有引致效应,即农民的消费支出与财政农业支出同方向变化。但是,在短期,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消费的影响波动性较大,农民的消费支出对财政农业支出的反映短期敏感,不利于稳定农民的消费预期。因此,政府应该建立财政支农的长效机制,稳定农民的消费预期,使之在中长期起到扩大农民消费的目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挖掘农民潜在的消费需求来刺激经济健康发展非常具有可行性。要刺激农村生活消费需求的增长,必须加大财政支农力度,解决农民后顾之忧,用长短期相结合的政策来促进农民增收。具体措施包括:

(一) 增加财政农业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现阶段我国农民的基本状况,决定了必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才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增长。

1. 完善财政对农业的转移支付体系。一方面,可以通过有效运用地区间和阶层间的转移支付来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增加财政对“三农”的转移支付力度。

2. 广开农民增收渠道。首先,财政应积极引导在农村发展社会化服务,让农民积极投身农业产品的产供销等环节,制定更积极公正的政策,鼓励引导其健康发展。其次,对于有条件的农村,应该支持鼓励其发展劳动密集型项目和产业,非农产业的发展能否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为充分的、有保障的以及有稳定预期收益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走农村新型工业化道路。最后,财政应该大力支持农民回乡创业,在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包括资金、技术等)都给予相应的支持,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等良好的硬件环境。

(二) 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改善消费环境

我国应该不断扩大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和降低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占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来增加财政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支持占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不断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消费环境的改善。

1. 降低农业事业费支出的比重。按照“精简、高效、统一”的原则对农业事业部门的人员和机构进行精简和整合,建立控制机构人员增长的刚性约束机制。

2. 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依法增加财政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提高财政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农业支出中的比重,建立财政保障机制来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

3. 提高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的比重。增加财政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的费用,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提高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在财政农业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是实施科技兴农战略的迫切要求^[4]。

(三) 完善财政支农补贴政策,保证农民直接受益

1. 增加财政补贴额度,改进财政补贴方式。首先,建立财政补贴对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其次,积极推进财政对农民的直接补贴。第三,我国政府应该切实改变财政过多补贴农业生产建设的方法,将财政农业支出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积极探索建立新型财政运作模式即由政府出资而市场进行运作,依法、依规采用补助、贴息、保险、减免税费、风险补偿、物资援助、购买服务等激励政策措施,把钱花到让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上,提高财政农业补贴的使用效率。第四,改变财政补贴方式。对面向农民的补助及支持,通过机存档管理、银行卡发放等方式,保证中间不会出现截流、挪用;改变对教育的补贴方式,变过去对教育部门和学校进行补助为直接对农民学生家长补助,建立一套规范的投入机制;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建立起消化农村债务的长效机制,调查债务状况、规模及成因,逐步帮助解决农村债务这一难题。

2. 改善农业补贴管理,保护农民利益。第一,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法规,使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成为一项长期和稳定的制度。第二,建立农业补贴综合管理体制。应强化农业部的职能,或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农业补贴的部级单位或部级的监管部门,整合财政补贴资金,集中财力办大事,集中、高效、协调财政农业补贴,解决目前农业补贴多头管理,以及在使用中的“跑、冒、滴、漏”的问题。

(四) 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 扩大消费市场

1. 推进农村城镇化步伐, 逐步淡化二元结构。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缩小城乡间的差距, 最重要的是缩小城乡间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差别。淡化二元经济结构, 完善户籍制度改革。政府应该使农民能够享受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变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现状。

2. 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政府应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发挥主体作用, 并带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5]。政府应采取措施, 提高农民素质, 培养新型农民, 转变农民的消费观念, 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第一, 建立以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主线的农村教育保障体系。第二, 设立以国家财政为主的农民教育基金, 建立农民教育的有效保障体系。笔者于2004年就在全国首次提出: 提高农民素质, 加强农民教育, 应尽快建立以国家财政支持为主的农民教育基金。农民教育基金应按我国GDP的一定比例设立, 至少5-10年, 并以法律形式给以确定, 而且农民教育应区别不同地区筹措与建立。第三, 建立农民教育费用补助机制。对于高中和大学阶段教育高额收费情况, 建议政府采取教育救助的方法来帮扶那些上不起又品学兼优的农村学生。根据农民的收入情况, 给予农民教育补助金等方式资助; 推广助学贷款, 贷款对象应该尽可能的覆盖所有不发达地区的贫困学生, 增加农民子女教育的助学贷款; 采取配套措施来进行高校收费改革, 完善教育投融资体制和高等教育助学机制, 切实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第四, 对农村困难学生实施免费职业教育政策。应该尽快出台在中等职业教育层次开办面向农村家庭的免费的学校职业教育, 使农村学生无论家庭条件贫富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职业学校提供的免费教育, 使他们能从农业进入非农业就业前获得必要的职前教育、掌握基本的就业技能。第五, 根据财力逐步按捺建立农民教育培训机制。

3.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第一, 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第二,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专项基金, 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针对我国农村老龄化人口和老年人口贫困风险问题, 政府应加快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努力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将城镇职工与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有机的衔接为一体。

(五) 明确政府职能, 建立健全农民消费配套设施

注重将多种政策措施协调配合, 实现既定的目标。

1. 财政与金融手段相结合共同促进农民的消费需求。现阶段, 我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时期。采取消费信贷措施, 一方面给予农民优惠利率等方面的支持, 不断深化农村的金融改革, 完善金融结构的法人治理结构, 大力发展农民的中小额贷款业务, 最终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另一方面, 通过贷款担保或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其他类的商业银行向农民进行贷款。单靠财政手段启动农民的消费市场, 短期内很难实现, 必须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起来, 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信贷政策。

2. 优化农村市场环境, 加强商品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我国政府应该大力加强农村市场秩序的整顿和监管, 加强农民对消费商品的识别能力, 增强他们的维权意识, 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使得农民能够放心的消费。

3. 增强农民的消费信心, 正确引导农民消费需求。政府应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 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为农民的消费创造良好的条件, 鼓励农民科学合理的消费。引导农民树立正确合理的消费观念, 接受科学、可持续的消费观念; 宣传积极的财政政策, 让农民真正了解政府在扩大消费方面的努力, 扩大农民消费的政策措施和农民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 正确引导农民科学消费, 重塑文化环境; 加强对农民和农村市场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商业知识教育、消费文化和消费意识教育, 尤其提高农消费者维权意识和识辨真伪的能力, 改变农村消费者落后的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 为整顿农村市场秩序和保障农村消费者合法权益创造条件; 鼓励农民增加在医疗保健、文化教育娱乐、交通通讯消费等方面的支出, 正确引导农民追求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逐步改善消费结构, 以减少消费的随意性和盲目模仿性。

参考文献:

[1]官永彬,张应良. 转轨时期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2):15 – 25.

[2]官永彬. 中国农村财政支出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104 – 110.

[3]尹世杰. 消费经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3.

[4]朱向东. 中国农民消费与市场[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96 – 115.

[5]范剑平,王小广.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28 – 341

[6]范剑平. 居民消费与中国经济发展[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212 – 220.

[7]尹世杰,王裕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中的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M].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103 – 111.

[8]刘振彪. 政府教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J]. 生产力研究, 2008(15):73 – 78.

[9]叶樊妮,王艳. 浅析我国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诱因[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13 – 15.

[10]谢伏瞻. “十二五”时期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J]. 行政管理改革,2011(2):30 – 34.

[11]柳文. 全力开拓农村消费大市场. 决策与信息[J]. 2006(5):18 – 25.

[12]新华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 <http://www.gov.cn>. 2006 – 03 – 16.

[13]胡永刚,杨智峰. 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产出与居民消费影响的SVAR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7):19 – 32.

[14]王文平. 我国的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民消费:1983 – 2007[J]. 经济体制改革,2009(1):97 – 100.

[15]易丹辉. 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6]潘寄青,沈涛. 农民工培训需求与资金支持机制建设[J]. 求索,2009(5):1 – 4.

[17]潘寄青,沈涛. 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农民工就业的政策研究[J]. 生产力研究,2009(8):36 – 38.

[18]潘寄青,李娜.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转移及就业路径探析[J]. 当代青年研究,2009(2):42 – 48.

[19]沈涛,潘寄青. 促进农民工技能培训的财政体系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2009(5):43 – 45.

[20]潘寄青,姜卫良,张小兵,韦中晶. 我国农民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60 – 63.

Effects of China Fiscal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on Peasants’ Consumption: from 1978 to 2013

PAN Jiqing¹, LI Guangyong², PAN Yuemeng³, LI Cuiping⁴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ic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3. CITIC Group Asset Management Co., Beijing 100001, China;4. Jinan Huangting Sports School, Jinan 250013, China)

Abstrac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an empirical study of how to stimulate peasants’ consumption are conducted by regression model and VAR model with fiscal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and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peasants as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1978 to 1997 the coefficient of fiscal agriculture expenditure is 0.94 while from 1998 to 2013 its coefficient is 0.44,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easants’ consumption bear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fiscal agriculture expenditure and that the role of fiscal agriculture expenditure in stimulating peasants’ consumption since 1997 is weaker than that during the beginning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The impact of fiscal agriculture expenditure can cause short term volatility in peasants’ consumption, so agriculture – supporting fiscal policy should emphasize long – term planning, stabilize peasants’ consumption expectations and eventually expand rural consumption.

Keywords: peasant; consumption demand; fiscal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fiscal policy

(责任编辑 刘小平)